



# 深入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四大优势

冯颜利 刘 涵



##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首先就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十五五”时期我国高质量发展如何取得显著成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这四大优势既是“十四五”时期取得巨大成就的坚实支撑,更是“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依靠。深入把握四大优势的内涵精髓与实践要求,对于凝聚发展信心、破解发展难题具有重大意义。

### 制度优势: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我国发展的最大优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定方向、管全局、保落实的根本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我国制度优势的鲜明特征,在于能够有效统筹短期增长与长期目标、效率提升与公平保障、市场活力与宏观调控之间的辩证关系。它既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发展出现大的波动,又能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优化,展现出强大的制度韧性与适应力。这一制度体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政府作用,形成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治理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制度红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这正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的关键部署。

新型举国体制是制度优势的集中彰显。在芯片自主研发、新能源产业布局、重大工程建设等关键领域,我国通过整合科技、资本、产业等各方资源,攻克了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跃升。面对全球经济波动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不确定性,制度优势转化为强大的风险抵御能力,科学的宏观调控能够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精准发力,以及产业政策的前瞻性引导,稳定市场预期、对冲外部冲击,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部署,则通过强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保障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构筑坚实的坚实屏障;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发挥国有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主导作用,又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创新活力与发展动力,形成多元主体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局面。从“十四五”时期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到中国式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最可靠的方向保障和动力支撑。

### 市场优势: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独有的宝贵资源,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源

泉。我国拥有超14亿人口和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内需市场,这种规模优势不仅体现在总量上,更凸显于需求的多样性和升级潜力上。从基础民生消费的品质升级到高端装备、数字服务的需求激增,多层次需求结构既为国内产业迭代提供广阔空间,也为全球企业搭建了潜力巨大的合作平台,成为连接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关键纽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重要任务,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正是对国内市场优势的深刻把握与运用。

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一方面体现在提升国内资源配置效率上,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技术含量与服务体验的敏感度与支付意愿的显著提升,对企业行为形成强有力的激励倒逼机制,促使供给体系持续加大在产品品质提升、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庞大的市场容量也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供丰富应用场景,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正是国内需求与技术创新良性互动的成果。另一方面,凸显在推动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上,中国市场持续汇聚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强大磁吸效应,吸引国际资本、先进技术、高端人才不断涌入,促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产业协作、供应链联动更加紧密,同时也为本土企业和全球跨国公司提供了巨大机遇,有效促进各方均能受益的经贸、投资和技术等领域合作。随着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逐步破除,国内市场的统一性、开放性进一步增强,将更有力地支撑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让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双循环格局下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 产业优势: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

完整产业体系优势是我国在长期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和坚实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正是基于我国产业体系独特优势作出的战略安排。我国拥有全球门类最全、规模领先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超过

220种工业产品产量全球第一。从基础原材料的自主供应,到核心零部件的精密制造,再到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形成了环环相扣、韧性强劲的产业生态,既避免了单一环节“断链”导致的发展风险,也为应对全球产业格局变动提供了战略缓冲。这种规模与结构兼备的产业基础,为我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

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突出表现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与自我修复能力。在疫情冲击和

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我国之所以能够快速恢复生产、保障民生供给,关键就在于从原材料供应到零部件制造,再到终端产品组装的全链条支撑能力。这种体系优势还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广阔空间:传统产业通过与新技术融合实现提质增效,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上下游协同中加速成长,大中小企业形成融通发展的生态格局。从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的扎实推进,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完整而富有层次的产业体系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载体。正如四中全会所强调,只有不断筑牢实体经济根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核心支撑,推动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从“量的优势”迈向“质的引领”。

### 人才优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

人才是第一资源,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是高质量发展的智慧源泉和创新动力。这一优势不仅体现在人才数量的规模效应上,更凸显于人才结构与产业需求的深度适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重要目标,继续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刻揭示了人才对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核心作用。经过多年培育,从支撑基础研究的战略科学家,到推动技术转化的工程技术人才,再到适配新兴产业的高技能工匠,我国已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高技能人才、战略科学家群体不断壮大,强大的人才储备成为抢占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的关键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

人才优势的价值在创新实践中充分彰显。在基础研究领域,顶尖学者的探索为技术创新奠定基础;在工程技术领域,能工巧匠的钻研推动了产品质量升级;在新兴产业领域,创业团队的攻关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正是凭借人才优势,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其根本在于激发人才的创造活力、释放人才的创新潜能。不论是“十四五”期间重大科技成果的持续涌现,还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实践充分表明:人才资源是贯通制

度优势、激活市场潜力、支撑产业升级的核心纽带,是推动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才强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具能动性的战略力量。只有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让各类人才各得其所、各展其长,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永不枯竭的创新动能。

### 有机统一:四大优势的协同发力之道

我国制度、市场、产业、人才四大优势并非简单并列,而是相互支撑、深度融合的有机整体,共同构筑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系统优势。制度优势是统领性优势,通过强大的组织动员和战略统筹能力,为市场运行、产业升级和人才创新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市场优势与产业优势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互动,超大规模市场为产业升级提供广阔空间,完整产业体系为市场需求提供坚实支撑;而人才优势则是激活全局的关键变量,将制度效能、市场潜力和产业基础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深刻体现了四大优势协同发力的系统思维。在“十五五”这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必须准确把握四大优势的内在逻辑,既要发挥制度优势的保障作用,又要激发市场活力,既要夯实产业根基,又要强化人才支撑,真正形成“四轮驱动”的协同效应,实现“1+1+1+1>4”的系统效能。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压力,这种协同发力的优势,在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中更为凸显。制度优势保障产业安全布局,市场优势消化过剩产能,产业优势维持供应链稳定,人才优势攻克技术瓶颈,四者联动方能形成强大的风险抵御合力,从而避免单一领域风险扩散为系统性危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复杂环境,我们更应坚定发展自信,准确把握四大优势的互动关系与融通路径。加强四大优势深度耦合的政策引导,让制度保障更精准对接市场、产业与人才需求,推动四大优势聚合为发展实效。通过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将市场潜力转化为增长空间,将产业基础转化为综合保障,将人才资源转化为创新内驱,我们必将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分别为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锚定“十五五” 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王 健 韩文婷

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根铸魂,创新理想信念教育,把牢正确舆论导向,凝聚社会共识,筑牢文化强国建设的信仰基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应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为重要抓手。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宣传思想文化事业中的具体体现,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总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应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归属。

### 坚持“第二个结合”,赓续中华文脉

一是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

二是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三是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原则。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面临新挑战,“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绘好一张蓝图,推动文物保护、历史城区、传统村落、文化廊道、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构建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在“大保护体系”下持续推动文化遗产动态管理和保护传承。

###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

一是增强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意识。要增强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广泛宣传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先进理念和成功案例,突破传统思维束缚,勇于创新创造,因地制宜,探索符合本地区、本

领域实际情况的改革路径。

二是健全文化改革发展法律法规。健全和完善文化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基础。要适度加快制定和完善针对国有文化资产的法律法规,确保国有文化资产的安全高效利用和有序运转,为文化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建立健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提高执法效率和专业化水平,维护文化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是建立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整合资源,优化机构设置和服务流程,完善文化体制机制的结构布局和职能配置,确保文化管理与生产经营体制的高效运行。建立健全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形成工作合力。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解决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甚至是“最后一米”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四是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加快文化产业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推动文化产业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深入分析市场需求和消费趋势,丰富文化市场供给,加强文化消费的引导和培育,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深度合作。加强市场监管和法治建设,坚

决打击侵权盗版、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文化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一是重塑对外传播格局。着力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其本质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际传播范式的系统性转型,要在实践中进行系统性推进,这对于破解“中国威胁论”等污名化叙事并提升国际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探索文明对话交流机制。探讨多模态传播对文化认同建构与重构的作用机制、智能体对跨文化交流的促进与推动;探索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构建文明间的交流机制,以增强跨文化理解与合作等。

三是构建国际传播体系。文化强国的本质不仅在于国内文化的繁荣发展,更在于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吸引力。因此,一方面,要构建涵盖宏观、微观和个体等多类别、多层次的叙事体系,使传播议题覆盖尽可能多的主体,提高“中国故事”的吸引力和受众接受率。另一方面,要提升跨文化表达能力,“要用国际化语言和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融通中外、贯通古今,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在准确传达中国立场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受众的文化背景、认知习惯和信息需求,采取差异化的话语传播和叙事策略。

(作者分别为天津市委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天津市委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均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本文为2025年度党校基地委托项目DXJD202510阶段性成果)